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学术争鸣 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

王雅克

摘要：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是中国古代学术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盛世之后，出现的第二个学术繁荣期。南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在学术上大都活跃或者思想成熟于这一时期。不同学派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思想，正是这些不同思想之间的碰撞，把宋儒的学术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南宋前期整体的政治文化背景是学术繁荣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

关键词：学术争鸣；宋儒；政治文化背景

一、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学术争鸣的概况

南宋孝宗朝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是南宋学术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在整个南宋 153 年的历史中，这 25 年的时间，相对而言，经济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政治较为清明，南宋内

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①，这就为此间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必要的现实基础。时人叶适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状况：“乾道五、六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土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②“率其群徒，辩其谈说”^③的争鸣局面再次出现了。

概而言之，乾道、淳熙年间的学术争鸣涉及到的主要学派有如下六个：福建学派（以朱熹为代表）、湖湘学派（以张栻为代表）、金华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永嘉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永康学派（以陈亮为代表）、江西学派（以陆九渊为代表）。这些学派之间的学术争鸣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学派（以下均简称为闽学）与湖湘学派围绕《知言》、“仁”与“性”等概念展开的“中和之辨”；与江西陆学围绕“无极太极”、“格物穷理与发明本心”、以《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为中心，对“熙宁变法”进行的探讨（其实质即在于对儒家“外王”思想的辨析）；与浙东事功派围绕“王霸义利”问题进行的争论，等等。这些论辩涉及到了世界观、方法论，政治改革，伦理道德等学术领域中的诸多方面，相对于南宋之前的学术而言，有批判当中的继承（如关于“仁”“义利”等问题的探讨），也有对学术在体系上存在的缺陷（如世界观）进行学理上的深度阐发，从而建构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学术体系；对后世来说，影响颇大，如王阳明的心学、清代的汉学就是在批判宋儒的过程中创立并发展起来的。从学术体系的完善性、学术争鸣的激烈性、学

① 陈国灿、方如金：《宋孝宗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② [宋]叶适：《叶适集》卷13《郭府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6页。

③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卷4《儒效篇第八》，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4页。

术探讨的深刻性等角度来审视，可以说，把梁启超先生提到的“儒学成熟的时代”^①的说法运用于南宋学术，是恰如其分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正是由于乾道、淳熙年间的学术争鸣，南宋学术才真正走向成熟。

发生在乾道、淳熙年间的学术争鸣，学派之多，人物之盛，思想内涵之丰，这是南宋历史上，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亮点。其中不仅仅有纵向的论争（如朱熹、吕祖谦和张栻围绕湖湘学派前辈学者《知言》进行的讨论；朱陆之间针对周敦颐《太极图说》进行的无极太极之辨），也有横向的论争（如朱陆的鹅湖之会；朱陈之间王霸义利之辨），这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是比较独特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是后来者对前辈学者的学术批判，即便是先秦诸子争鸣，也往往存在着前后不等的时间间隔。如此多的学派集中出现、成熟于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并且进行了涉及世界观、本体论、方法论、实践观、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探讨，这是十分难得的。所以，对学术争鸣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研究思考，才显得更为重要。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政治文化方面的背景。

二、乾道、淳熙年间学术争鸣产生的背景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学术的产生和发展都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这一阶段的社会环境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学术的发展方向。经济基础作为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对学术思想的产生多是一种间接的影响，而直接的影响则来源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以及同时期前后重要思想家们彼此之间或同或异的思维活动或者

^① 梁启超：《儒家哲学》，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4 页。

思想成果，这些思维活动或者思想成果之间的交锋，为学术的产生和发展搭建了一个平台，这是特定历史阶段学术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文化背景。

（一）政治背景

宋孝宗在即位之前一直力主抗金，对秦桧等人的议和投降很是不满。即位之后，怀有恢复之志的宋孝宗立即着手进行恢复中原的相关事宜，如公开为岳飞父子平反，厚礼安葬，并敕碑建祠，以供后人纪念。这样，不仅表明了孝宗本人的恢复之志，同时也鼓舞了士气；重用陈康伯、虞允文、周必大、汪应辰、王十朋等一批主战派的官员，整顿军纪，加强军备，查处懦弱平庸、备战不力的官员等等。可以说以上措施的推行为孝宗朝的政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高宗朝三十多年的政治所遗留下来的消极影响，在短时期之内是无法得到改观的，这种消极影响甚至于无形中成为一种氛围，这种氛围的存在极大地阻碍了孝宗本人改革措施的推行，更为严重的是，消磨了孝宗的恢复之志。此外，身为太上皇的宋高宗暗中鼓动曾为帝师、时为参知政事的史浩等人反对北伐，力主对金议和以求苟安。甚至直接干预孝宗的人事任免，由主张议和的汤思退出任左相，以牵制作为右相主战的张浚。就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过程中，孝宗不但失去了北伐的时机，而且对原本怀有的恢复之志逐渐动摇了。其后的隆兴北伐，虽然在孝宗的竭力推动之下展开了，并且在战争之初取得了些许的胜利，但最终在金军迅速调整部署、反击之下，以符离大败的结局而告终，前后仅仅持续二十余天。其后，隆兴二年（1164）宋金再次签订新的和约，史称“隆兴和议”。“隆兴和议”之后，宋孝宗又为北伐做了近十年的准备，这之间包括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提高武臣的政治地位等，但是这些积极备战的措施却在朝廷上下一片反对声中成效甚微，孝宗即位之初的宏图大志也随之日渐消磨，而趋于逸乐。

概而言之，宋孝宗一朝的政治特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宋孝宗即位之后面临着一个源于宋高宗对金屈膝苟安的局面，并且这个局面不利于宋孝宗实现其恢复之志；另一方面是宋孝宗为了改变这种消极的政治局面，为此采取了种种措施，尽可能营造一种相对清明的政治局面。这两方面的特征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孝宗朝的政治。

第一，针对各地方出现的自然灾害频繁、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孝宗即位以来，即采取了积极措施加以缓解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以及稳定社会秩序。如针对四川等地颁布“宽恤事十八条”，免去四川等地常年所欠租赋；相继三次颁布赈灾诏令，免去受灾地区的全部租赋；在赈济灾民的同时，也出台了相应规定，以保证赈灾效果：“诸路漕司以水旱之实闻，州县隐蔽者并置于法”^①，加强对于赈灾过程的监管力度。可以说，这些诏令和法令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孝宗朝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孝宗朝学术争鸣的大前提。

第二，针对高宗朝“廷臣以箝默为贤，荣悦为忠”的局面，孝宗在即位后第九天就下诏，广开言路，要求大臣们畅论时政、积极谏言：“朕躬有过失，朝政有阙遗，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吾元元，辅朕不逮者，皆朕所乐闻。”^②此后又多次下诏，并令朝臣轮流入宫，面陈时弊。另外强调：“诸路监司、守臣察今秋有田禾不熟之处，预先讲求救荒之政，如将来水旱去处却致无备，必置于罚；如备预有方，当议推赏。”^③其目的在于提倡、培养朝臣们务实勤政的风气。这种风气的养成，于朝，有利于大臣们进谏忠言，孝宗深有感触；于野，利于无功名但有

①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 47，乾道四年六月甲午，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 《宋史全文》卷 23 下，绍兴三十二年六月甲申，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③ 《宋史全文》卷 24 下，乾道二年五月丁卯，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才学的士人也积极参政，不然的话，身为布衣、头无寸职的陈亮怎么可能“六达帝廷上书，两讥宰相无能”呢？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为思想上的表述自由奠定了基础。

第三，“三冗”现象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南宋。其中，“冗官”是导致朝政腐败、官吏办事效率低下的重要因素。针对此现象，为了提高官员本身的为政素质、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孝宗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先后四次裁汰冗员，精简机构。为了进一步限制官僚队伍的膨胀，孝宗又对有宋以来一直推行的荫补任子法和官员荐举制实行改革^①。此外，对官吏赏罚严明，加大对官吏贪污腐败的惩治力度的同时，明确勤于政事、业绩显著在官吏升迁过程中的重要性。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遏制了朝中冗员激增的现象，从而有助于澄清吏治。

从整体上看，宋孝宗统治时期，南宋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逐渐趋于相对稳定的发展状态，虽然这种稳定是以隆兴和议为代价而换取的。通过实施或者改革相应的经济政策、选官用人政策、广开言路等，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振兴士风、澄清吏治、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这才有了后来史学家对孝宗朝“小康之世”的评价。这就为思想界的争鸣奠定了一个现实基础。当然，这种“小康之世”“政治清明”的评价，相对于此前的高宗朝和此后的光宗朝、宁宗朝、理宗朝等而言的，并不是绝对的“小康”、“清明”。如孝宗朝也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湖北的赖文政起义、广西的李接起义和湖南的陈峒、邝深起义，等等。究其原因，仍然来自于尖锐的社会矛盾。经济上的繁荣，政治上的复杂，自然导致了思想领域中纷繁复杂的情况，思想论辩、学术争鸣也就不可避免了。

^① 参见漆侠主编《辽宋西夏金代通史》（政治军事卷），第17章第2节《宋孝宗统治前期的南宋政局》，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二）思想背景

这是学术争鸣产生的土壤，也是最能够影响学术现状及其发展的因素。孝宗朝乾道、淳熙年间的学术发展呈现出一派繁盛的景象，除了有南宋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孝宗朝政治相对清明这个大环境以外，思想文化领域是学术发展更直接的土壤。思想家处在一种其他思想家为其营造的思想氛围当中，与其他思想家的关系（包括学术、政治和个人交往三个主要方面）会成为该思想家学术活动的刺激因素。思想家的思想成果往往是在由其他思想家思维成果搭建的平台上展示出来的。暂且不论这种思想成果的价值如何，单就其产生而言，正是在与其他思想或正式或非正式的交锋过程中，在破与立的过程中产生的。

针对南宋的国势，振兴以求恢复失地是国家的政治主题。浙东事功派陈亮对时局是这样分析的：“秦桧以和误国二十余年，而天下之气索然而无余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内之志，又二十余年而天下之士始知所向。其有功德于宗庙社稷者，非臣区区之所能诵说其万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举以惊动慈颜，抑心俯首以致色养，圣孝之盛，书册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皇帝既已祔庙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①在他看来，高宗朝秦桧的议和（其实质则是高宗的苟安求和）对于社稷安危、国祚绵延来说，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议和造成了长期以来沉闷、苟安的形势。直到孝宗登基以来，“削平宇内之志”使得天下之士知其所当为，从而形势为之一振。加之此时高宗皇帝“既已祔庙”，孝宗更应该抓住当前的有利形势，大展宏图之志。陈亮在上书中力陈恢复的必要性，并且深刻地指出了时局变化难

^① [宋] 陈亮：《陈亮集》卷1《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16页。

测，恢复之事必须要抓住时机：“自古夷狄之强，未有四五十年而无变者，稽之天时，揆之人事，当不远矣。不于此时早为之图，纵有他变，何以乘之！万一虜人惩创，更立令主；不然，豪杰并起，业归他姓，则南北之患方始。又况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谢，生长于戎，岂知有我！”^① 如果要北复失地以雪汉唐所未有的“北狩之痛”，就必须“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极帝王伯之道，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察而知也。”^② 恢复的主张和经世致用的事功思想自然成为了永康学派的思想主体。

同是针对振兴以求恢复这一政治主题，湖湘学派的胡宏对时政则是这样分析的：“近世以来，行义凋损，政事殆废，风俗薄恶，人民嚣顽。子弟变父兄者有之，为王臣而从盗贼者有之，为诸生而献敌庭者有之，卒弑其守者有之，民杀其令者有之，执亲之丧而谋从王事者有之，以卑贱而微诟动摇尊长者有之。上下习以为常，恬不知怪，而三纲绝息，人道大坏，乱之所由作，兵之所由起也。”^③ 把根本原因归于“三纲绝息，人道大坏，乱之所由作，兵之所由起也”。对于改革军政弊端，胡宏认为：“革之道，在人君深自刻励，优恤将士，与同甘苦，拔忠义武勇之士以为元帅，料简诸将之兵，汰其庸懦，申以阶级之法，考校诸将之众，明以分画之制，而增损修整之。见众不必更募，罢招刺，禁扳换，勤训习，其间必将有部分严飭士卒精练者，特加奖擢。出从征伐，惟才是用，无必官资。捕斩首级者，赏之以金帛，灭贼复地者，赏之以官爵，封之以国土。有犯令者，亲贵必诛，赏罚严明。此孙武子所以制胜于天下，诸葛公所以抗衡于中原者也。

① [宋] 陈亮：《陈亮集》卷2《中兴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2页。

② [宋] 陈亮：《陈亮集》卷2《中兴论》，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页。

③ [宋] 胡宏：《胡宏集·中兴业·易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8页。

何桀贼之不灭，黠寇之不膺，中兴之无望乎！”^①从胡宏所提出来的改革要点来看，也尽是经世致用的方法，这与浙东事功派的主张有一致性。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些“经世致用”是有前提的，换句话说，这只是“用”，而“体”则是“理义”，“理义”是天下之根本，也是为政之根本：“为天下者，必本于理义。理也者，天下之大体也；义也者，天下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义不可以不精。理明，然后纲纪可正；义精，然后权衡可平。纲纪正，权衡平，则万事治，百姓服，四海同。”^②从根本上来讲，胡宏不同于陈亮，湖湘之学不同于永康之学。

朱熹作为南宋大儒，一代理学宗师，绝不像陈亮所谓“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不知何者谓之性命”^③的儒士。宋孝宗即位之初，下诏求直言，朱熹即上奏章，一方面是劝谏，指出身为帝王之所当学，另一方面简要分析国势，明确帝王之学的目的所在：“‘圣躬虽未有过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修攘之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误之也。夫金人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明矣。愿断以义理之公，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数年之后，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④帝王“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应天下之务”，经世致用是目的，格物致知是实现目的的途径。并且朱熹很明确地解释了“天下之务”：

① [宋]胡宏：《胡宏集·中兴业·练兵》，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2页。

② [宋]胡宏：《胡宏集·知言·义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页。

③ [宋]陈亮：《陈亮集》卷1《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页。

④ [元]脱脱等：《宋史》卷429《朱熹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52页。

“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① 为了实现“国富兵强”的目的，就“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②，也就是说，要想“经世致用”，“格物穷理”是前提条件。在这一点上，朱熹与陆九渊实际上是统一的，并且在他们二人执政于地方之时，都取得了相当的政绩，如 1178 年朱熹出任“知南康军”，上疏减免租税、雇佣饥民修复长江石堤，极大地缓和了社会矛盾，深得当地百姓拥护；陆九渊荆门之政，“政行令修，民俗为变”^③。可以说实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只是二人在如何能够达到“经世致用”的途径方面，确有分歧，但殊途而同归，也正是因为最终目的是同一的，所以在为学之法二人也才有必要争论，才有了争论。

对后世学术思想影响极大的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其荆门之政的奇迹就为学者所津津乐道^④，时人周必大这样评价陆九渊：“荆门之政，可以验躬行之效。”^⑤ 然而，陆九渊的荆门之政的指导思想则在于“仁”“心”：“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从事其末，国不可得而治矣。”^⑥ 我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 429《朱熹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753~12754 页。

② 脱脱等：《宋史》卷 429《朱熹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752 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卷 434《陆九渊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第 12882 页。

④ 参见涂宗流《忧国忧民的一代名臣——评陆九渊的荆门之政》，《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1999 年 7 月和郑晓江《儒家德治观念与实践研究——以陆象山“荆门之政”为例》，《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4 期等文章。

⑤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 36《年谱》，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512 页。

⑥ [宋]陆九渊：《陆九渊集》卷 19《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33 页。

们甚至可以把陆九渊“仁”“心”与为政的关系理解为体与用的关系。“学者问：‘荆门之政何先？’对曰：‘必也正人心乎。’”^①在此处，陆九渊很明确地提出“正人心”是先于“荆门之政”的。他并不反对经世致用，也不是崇尚空谈，关键在于如何实现经世致用的目的，这个途径就是首先要“格物穷理”，从根本上着眼，而不是单纯的为经世致用而经世致用，那样的话，为学则窄，为政则窘。这就恰如一棵参天大树，“荆门之政”为枝叶，“人心之正”为根基。正是由于根基的存在与不断输送养分，枝叶才起到了为人们遮阳挡雨的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功用，但是功用背后的根本缘由，确难为人们所察觉。

上述学派代表人物的观点相互之间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都对南宋的国势进行了分析，明确了“灭桀贼，膺黠寇，望中兴”的主题，最终落脚在“经世致用”方面。不同之处则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才能够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浙东事功派就事论事，力求从历史与现实当中直接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在短时期内最容易显现效果的方法，但同时也要不断地变革以适应新的环境，以解决新生的问题。而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经过反思，选择的却是“格物穷理”，由“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由规范个体行为到引导群体作为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根本的方法，但同时也很难在短时期之内看到它的实际功用。这是一对矛盾。学术上的这对矛盾，是推动孝宗朝乾道、淳熙年间学术争鸣的根本的、内在的动力。殊途而同归，归同而途殊，学术争鸣势在必行。

^① [宋] 陆九渊：《陆九渊集》卷 34《语录上》，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425 页。

三、小结

南宋孝宗朝乾道、淳熙年间的学术争鸣在两宋学术史上留下了莫大的声光。在这个时期中，南宋的许多著名思想家针对南宋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这样的局面极其类似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而且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一时期的学术发展又对先秦有所超越（如朱陆之间“无极太极”之辩实质上是围绕本体论展开的论争，这是先秦学术未能深入探讨的）。而孝宗朝及其前期的政治、思想背景是乾道、淳熙年间学术繁荣的外部条件。学术史上任何命题的提出与讨论都绝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对这一时期政治局面的分析以及思想背景的梳理，对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学术发展史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者通信地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